

現代訓詁學的成功實踐

鍾明立*

傳統訓詁如何繼承與發展？這是八十年代訓詁學復興以來語言學者苦苦思索的問題。十多年來，眾多語言學者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了回答。這些成果主要有兩類：一是用現代科學的語言理論來總結和探討傳統訓詁學的方法與規律，古為今用，重在繼承。二是大力訓釋古代口語俗詞、近代漢語詞匯，填補傳統訓詁的空白。這兩類成績章明較著，功不可沒。今日，訓詁學這門古老學科又面臨著如何改革創新的問題。換言之，時代召喚創建科學的現代訓詁學，時代降大任於今日之語言學者。

最近，有幸讀到黃金貴的《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下簡稱《辨考》），十分感奮。全書1594頁，洋洋一百一十六萬餘字，可分為理論和實踐兩部分。理論部分是《自序》和「附錄一」之《論古代文化詞語及其訓釋》，實踐部分則是二百六十二篇辨考文章。是書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該書的出版，是當前學術界的一件喜事。

是書有如下矚目之處：

一、提出了對詞匯的新的二分法，並第一次將古代文化詞語作為全書的訓釋對象。

詞匯是一個集合體的名稱，它指的是一種語言裏所有詞的總和。自古以來，漢語詞匯有實字和虛字之別、基本詞匯和一般詞匯之分等。黃金貴在《辨考》中，提出了對詞匯的新的二分法，即把詞匯按照體現文化意義的強弱和有無之狀況將詞匯分為文化詞語和通義詞語兩大類。文化詞語指「有不同程度文化意義者」，通義詞語指文化意義「弱而至無者」（頁1454）。¹

將詞匯分為文化詞語和通義詞語，是對我國詞匯研究的優良傳統的繼承與發揚。《爾雅》是我國義系辭書的不祧之祖，它將上古漢語詞語類聚群分，開創了獨立的詞匯學研究，奠定了上古漢語詞匯二分法的格局。全書共有十九篇，前三篇《釋詁》、《釋言》、《釋訓》訓釋通義詞語，後十六篇《釋親》、《釋宮》、《釋器》等則訓釋文化詞語。又如《釋名》一書，也是分為通義詞語和文化詞語兩大類。全書共有八卷二十七類，其中《釋言語》、《釋姿容》訓釋通義詞語，其餘全是訓釋文化詞語。又如現代的大型辭書《辭海》，也是分為語詞分冊和百科分冊的。

* 杭州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1 本文凡轉述《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之處，均只標頁碼。

將詞匯分為文化詞語和通義詞語，也符合語言反映文化的規律和特點，符合漢語詞匯的實際。語言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它不僅反映著語言本身，而且是紀錄文化的符號系統；它是文化的忠實記錄者。語言反映文化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它的不平衡性，亦即在語言的諸部門間及其一個部門的內部，受文化的影響與反映文化的多寡並不同。漢語的情況正是這樣，反映文化最薄弱的部門是語音，反映文化最深廣的是詞匯。而在詞匯中，與文化關係最為密切的是名詞，最為疏淺的是虛詞。

將詞匯分為文化詞語和通義詞語，有利於創建科學的現代訓詁學。文化詞語在整個漢語詞匯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早在甲骨文裏，文化詞語便佔絕大多數。王力說：「在甲骨文裏，動詞和形容詞的數目比起名詞來是不多的。」² 古人也早有明識：「大抵古人製字，皆從事物上起。」（周伯琦《六書正訛》）黃金貴還通過對一些有代表性的詞匯專書和訓詁專著如《爾雅》、《說文》、《楚辭通故》、《鄭雅》等作了一番客觀的調查、對比，得出古漢語詞匯中文化詞語與通義詞語的數量之比是2：1的結論。因此，把詞匯分為文化詞語和通義詞語，肯定文化詞語在古漢語詞匯中的重要地位，加大文化詞語的訓釋力度，有利於創建科學的現代訓詁學。

運用對詞匯的這種新的二分法來考察傳統訓詁和當今訓詁實踐，不難發現古代文化詞語是傳統訓詁的主要訓釋對象之一，傳統訓詁為了通經致用而對文化詞語和通義詞語兼收並蓄。「但是，由於時代局限，恰恰是傳統訓詁家對文化詞語訓釋，其成績遠不及通義詞語，其中失詁、渾詁、偏詁、誤詁者尤多。即便是正詁，也往往語焉不詳。」（《辨考·自序》）而本世紀來，語言學獨立成科，但在加強科學性的同時，卻忽視了語言與周邊學科的聯繫，產生了「純語言」研究的傾向。故當今詞匯訓詁之作，大多是以研究通義詞語為主；即涉及文化詞語，也往往以研究通義詞語的方法處之。「由此可見，對文化詞語的訓釋，既是傳統訓詁沒有解決，也是當今訓詁更為忽視的重要方面。」（同上）黃先生《辨考》一書，繼承並發揚了傳統訓詁的優良傳統，重視當今訓詁學界所忽視的文化詞語研究，第一次把古代文化詞語看作訓釋對象。是書一共訓釋了國家、經濟、人體、服飾、飲食、建築、交通和雜物八大物類共1,306個文化詞語，內容豐富，分類科學。尤其是書中糾正了古今失詁、誤詁者四百餘條，比如：「幸」，一般詞典都列「帝王駕臨」這一文化義，而不知它還是君王、帝王與正后外女子性活動的婉曲詞。《戰國策》已多見：「王必幸妾。」「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楚策四》）。《史記·外戚世家》承用：「〔漢王〕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一幸生男」（頁1468）。又如《戰國策·魏策四》：「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漢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或注：「一道白氣直衝上太陽。」辭書或釋「虹的一種」。黃金貴考證為：白虹不是虹，而是在日暈時並見幾個幻日，有白色光帶相切

2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下冊，頁493。

連的大氣光學現象，古代又稱「彌」，今科學上稱「幻日環」(頁1470)。

二、提出並實踐了「系統辨考」的基本訓詁方法，並廣泛運用文獻證、文化證和多種求義法考辨詞義。

自《爾雅》、《說文》、《釋名》、《方言》問世以來，歷代訓詁學家逐漸總結、揭示了「以形索義」、「因聲求義」、「比較互證」、「目驗和統計」等訓詁方法。這些方法仍然常為今天的語文工作者所使用。但現代訓詁方法也需要創新發展。黃金貴提出並實踐了一種「系統辨考」的基本訓詁方法，這是《辨考》一書又一學術價值所在。

訓詁的中心任務是訓釋詞義。一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詞義的從一點(本義)出發，沿著它的特點所決定的方向，按照各民族的習慣，不斷產生新義或派生新詞，從而構成有系統的義列」；³另一方面，在某一歷史時期，多義詞的某一義位，原則上都有自己的同義、類義群體。因此，正確的詞語訓釋，應是這縱橫兩種系統交叉的坐標點。時下，前者大家已很熟悉，後者卻鮮為人知，亦即很少注意「系統辨考」的訓詁方法。雖然當前也有些同義詞辨析之作，但其「辨析多是不顧詞義的系統性，人為地將二、三個同義詞歸為一組，以整個詞(不以一個義項)為單位，分項述說諸詞『本義不同、引申義不同、語源不同、語法功能不同、感情色彩不同』之類，至於相同義中的不同，則幾乎是零」(《辨考·自序》)。黃金貴通過大量實踐證明：「同義詞，是具有不同『義象』(理性意義或附加意義的同中之異)、共同表示一個義位(詞義)系統的詞群。每個多義詞的每個義位，原則上都可以有自己的同義伙伴；整個詞匯，可以構成以義位為基準、橫向組合的分類詞匯系統」(同上)。這就從理論上把一般被認為「難有作為」的古漢語同義詞辨析發展為古漢語詞義系統辨考的訓詁方法。《辨考》全書就是對這一理論的檢驗、實踐。其操作步驟是：在訓釋某義時，首先為初訓義找出它的同義詞群，將它置於同義詞的系統中，然後加以辨析考察，從而確定「坐標點」，獲如其準確的「義象」，規正義解，訓釋才告完成。要之，黃金貴是堅持以詞義而不是以詞為辨析單位，即以一個相同義(義位)作為構組與辨析基準，力辨一義的「同中之異」。如訓釋「建於高臺的獨立建築物」，作者找出了「觀」、「象魏」、「闕」三個同義詞，並加以系統的辨析考證。結論為：「觀」，上古朝廷門前建於高臺的獨立建築物，可登觀或懸布文告。「闕」，漢代建於高臺的獨立建築物，使用對象、範圍廣於觀，設置地點異於觀，形制多於觀，主要起禮儀裝飾和標志(高官等第)作用。「闕」至唐以後消亡，但「闕」常作皇帝、朝廷的代稱。「象魏」，上古作「觀」的別稱，秦以後單用或分別以詞素與他詞連用而作「闕」的別稱(頁986—91)。又如釋財物，黃金貴找出了「財」、「貨」、「資」、「賄」、「賂」五個同義詞，並加以系統的辨考。結論為：「財」，財物總

3 陸宗達、王寧：《訓詁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140。

稱；「貨」，流通的財物，即商品與錢幣；「資」，為一定需要而積聚的財物或其他諸物；「賄」，暗藏、私藏的財物；「賂」，為求人酬人而贈送的財物（頁225—59）。是書一共系統辨考了二百六十二組文化類同義詞，解決了不少古代文化詞義訓釋中的問題。

由於辨釋文化詞的詞義比辨釋通義詞的詞義更難，而且要做到無證不言，證皆有據，因此需要多重證。作者在《辨考》中，就廣泛運用文獻證、文化史證、考古文物證、今語證、方言證來考辨文化詞義，這是本書的又一特色。如：「豚」，當今一些辭書和語言專書都解釋為「小豬」。但該解施之於文獻，當會扞格。《墨子·非攻上》：「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這裏，「犬、豕、雞、豚」並列，均指家畜。且「豕」為豬，應包括大豬、小豬，但墨子何以又列一小豬「豚」，豈不與前「豕」重複？黃金貴採用畜牧闢割史證，得出「豚」為專供食用的闢豬（頁428—30）。於是上文句便迎刃而解。受他的啟發，我們想起《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歷來注家都把「豚」訓作「小豬」。原來是陽貨送給孔子一隻肉嫩膘肥的闢豬。《辨考》第221篇還辨考了「甃」等字。「甃」字文獻早見《詩·陳風·防有鵲巢》：「中唐有甃。」（「中唐」，中庭之路。）今所有的辭書都承漢晉古訓，把「甃」解釋為磚的古稱。而考古、建築史學者認為《詩經》時代於磚缺乏實物例證，且到漢代才始用磚鋪地。因此，文獻與實物不能相合，頗感困惑。黃金貴運用大量的建築史、陶瓷史、水井史知識，與語言資料相合證，從而考定「甃」的本義乃指陶水管，這就糾正了近千年來的誤訓。《辨考》還考辨了「犍」、「犗」：這兩個字皆是闢牛之稱。早期用「犗」，後來「犍」、「犗」並用，但「犍」多作動詞。為了印證該訓，黃金貴運用1976年發現的河南方城漢墓畫像石《犍牛圖》來考辨「犍」為何事：圖中主體是一被闢之牛，右一人戴尖頂帽赤臂蹲跪，右手握舉利刃，趁牛前跳、擡左後腿之瞬間，左手抓捧牛的大舉丸，操刀欲割，牛則張口而吼，後蹄蹶起踢人（頁431—32）——活靈活現的《犍牛圖》，力證「犍」為闢牛而非它。作者此解甚確，受其啟發，我們聯想到一組由「建」得聲的形聲字：「犍」為牛之舉丸，「犍」為門栓之插，「犍」即肯，身體要害部分。「犍」又為犗也（見《玉篇·牛部》）；犗，即割牛之舉丸。犍了，便失去生殖能力；犗了，則健壯。

在進行系統辨考中，作者不僅善於運用多重證，而且還長於運用多種求義法，下舉兩種：

求證詞義，我們通常採用從本義求引申義的方法，此不煩言。黃金貴在《辨考》中，還採用從引申義推求本義的方法。如「中」的本義，一直眾說紛紜，或謂旌旗，或謂箭靶子，或謂錢貫，五花八門。然「中」的本義為何呢？黃金貴從「中」的引申義入手進行論證。他將「中」的所有引申義分為兩類：一是中間義系，二是京城、君王、身。而其本義必是可統兩類諸義者。黃金貴檢甲骨文中「中」字甚多，且有作名詞的「立中」詞例二十餘。解釋紛如：旌旗、箭靶、錢貫、建鼓、測日儀等。從引申義推之，「中」的本義唯測日儀最洽。蓋「中」之測日必在一日之中，故得中間義；由此衍生該義系的

其他所有義項。又「中」之測日，其一目的是觀察天體運動，故由此引申為天道，再引申為掌握天道的人——君王。「侍中」、「中常侍」、「中涓」、「中貴人」等官名之「中」皆為此義。進而帝王所居，則為京城。《史記·淮陰侯列傳》：「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從中起」指從京城內應。詞語「中都」亦可指京都。至於「中」有「身」義，則是因測日之表與人身長等同（高八尺）之故（頁307—8）。這樣便解決了至今聚訟不已的「中」之本義，且能與其他義解貫通。

運用聲符釋義。宋人王聖美總結出漢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的特點，提出「右文說」。清代段玉裁、王念孫等對此有所發展，認為要通過形聲字所標的聲音去求義。黃金貴在《辨考》中也善用此法，如運用此法辨「根」、「柢」：這兩個字皆指伸入土中的根，古今通義。但二者有別。「根」，從木艮聲，聲兼義。艮聲字有橫義。如「眼」，目之橫；「垠」，地域遠橫的界岸；「限」，門楣（見《說文》）。故「根」為下伸於地的橫布鬚根。而「柢」其初文是「氏」。「氏」聲字每有直義。「氏」，至也。「氏首」，猶俯首（見《漢書·食貨志》注），指首自上而下；「阨」，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者，亦自上而下；故「柢」為植物自上而下的直根（頁337—38）。又如：「饅頭」、「饅」，曼聲均取蒙覆義，故前者必是上不開口圓狀物，後者可為塗飾義。「經」，巫聲為直義，故「經」為吊死。「饗飧」，早餐晚餐。「饗」是會意兼聲，其聲符「雍」有聚大義，故「饗」之早餐相當卜辭之「大食」，可知古人一日兩餐以早餐為主（頁1494）。全書運用聲符求義近500條，佔全書近千個形聲字的54%。這是至今運用「右文」釋義最多的一本訓詁之作。

三、運用歷史的眼光，窮源溯流，悉心辨考文化詞義的產生及其變遷。

《辨考》的另一學術價值，是作者能夠運用歷史的眼光，窮源溯流，悉心辨考眾多文化詞義的產生及其變遷。從這一意義來說，《辨考》也是一部古代文化詞義史。如首篇《方·邦·國》（頁1—9）即是。《辨考》云：表示國家之義，我國古代有「方」、「邦」、「國」。國家是私有制和階級對立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有夏四百多年，仍是氏族制向奴隸制的過渡階段。到了商代，奴隸制國家形式得到了發展和鞏固，以血緣團體為基礎的部落或部落聯盟大都轉變為「方」，即以地區團體為基礎的奴隸制國家。它們一般是自然形成、有相對獨立性，與商王朝關係疏遠。「方」之表國家的通稱亦見於文獻：《論語·堯曰》載商湯的文告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左傳·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辨考》繼云：從西周特別是成王起，實行了大規模的分封制，所封諸國是「國中之國」，國政自理，但又總屬於周天子，有蕃屏周王朝的義務。因此，商代之「方」已不合周代國家之實，於是表示國家通稱之「邦」應運而起。「邦」亦多見於周朝早期傳世文獻中，如《詩經》中表國家之義多用「邦」：《大雅·皇矣》：「王此大邦。」《小雅·黃鳥》：「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辨考》最後云：春秋是中國奴隸制社會的衰落期，郡縣制逐漸取代了分封制，各國諸侯紛紛獨立，周天子終於失去了諸侯「共主」的地位，逐漸降為一個小諸侯國的格

局。反映到國家的稱名上，帶有分封特徵之「邦」顯然已名不副實，於是義近於「邦」之「或」起而代之，並加「口」成「國」，以別於域。「國」之表國家義亦見反映春秋語言之《論語》中，如「道千乘之國」（《學而》），「為國以禮」（《先進》）。總之，表示國家之通稱，殷商用「方」，周代用「邦」，春秋主要用「國」，而後一直用「國」，以至於今。

《辨考》中的這種古代文化詞義史的篇章很多，很精彩。又如第2篇《邑·國·都·京》：國都之稱，商代尚無。西周有「邑」；東周有「國」；秦以後用「京」，並兼用「都」。第56篇《梱·杼·梭》：表示「梭子」之義，春秋戰國以前用「梱」，春秋戰國時已用「杼」，兩晉南北朝主要用「梭」，且一直沿用至今。等等。

王力曾說：「從歷史上去觀察語義的變遷，然後訓詁學才有新的價值，……等到訓詁脫離了經學而歸入了史的領域後，新的訓詁學才算成立。」⁴黃金貴的《辨考》，正是一部這樣的新的訓詁學力作。

總之，黃金貴在《辨考》一書中，提出了對詞匯的新的二分法，並第一次將古代文化詞語作為全書的訓釋對象。作者在書中還提出並實踐了一種「系統辨考」的基本訓詁方法，並廣泛採用文獻證、尤其是文化證以及運用多種求義法來考辨古代文化詞義，窮源溯流，屢有創新。因此，黃金貴的《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誠為現代訓詁學的成功實踐。

4 王力：《新訓詁學》，載王力：《龍蟲並雕齋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一冊，頁327。